

汉水文化研究集刊

5

刘保民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水文化研究集刊. 5/刘保民主编.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04-3704-0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汉水—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3176 号

汉水文化研究集刊(五)

作 者 刘保民 主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9)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6 开 19.5 印张

字 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704-0

定 价 39.00 元

陕西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水文化研究中心”

汉水文化研究集刊(五)

编委会

主 编 刘保民

副 主 编 张西虎 刘 莉

学 术 顾 问 刘舜康 方光华 萧正洪 潘世东 冯岁平
王 蓬 雷 勇 蔡云辉

编委会主任 刘保民

编委会委员 刘清河 梁中效 冯明放 付兴林 吉武昌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亦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水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汉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汉水流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与中华文化大体一致的发展轨迹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不少文化事象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或重要地位。传承文化、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地处汉水上游的高等学校——陕西理工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汉水文化,可以引导汉水流域的人们认识历史、审视文化,把握流淌在本流域人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从而使这一地处中西部尚属欠发达区域的人们摆脱浮躁,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不至于盲目地迷失文化自我,进而提升其文化自信心;同时也为这一区域当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咨询。多年来,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在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水文化研究中心作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年来在汉水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科普读物和大量的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尤其是在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南水北调和汉水流域文化史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为使研究成果能尽快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除定期刊发一年四期的《汉水文化研究》期刊之外,还不定期编发《汉水文化研究集刊》,将已发表和尚为发表的与汉水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汇编成集,正式出版,以方便人们翻阅、查询。此前已相继出版了四集,这是第五集,是最近一年左右有关汉水文化研究的论文选粹。收入本集的35篇文章,不少是提交相关学术研讨会尚无公开发表的论文。依照集刊编排体例,本集的文章仍然分为“历史文化篇”“文学艺

术篇”和“区域经济篇”三个部分。

“历史文化篇”中的1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事象钩沉稽隐,探幽发微,论析了多种历史文化事象特定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意蕴。如《说“汉”》一文,论证了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融通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民族得以形成和名扬寰宇的摇篮。《历史上的僦骆道南段勘察记》一文,是资深的栈道文化研究专家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并结合史料记载,具体探寻僦骆道南段路线及其沿途遗迹,考证相关轶事和疑案的专题文章。《清代汉江流域交通与城镇兴衰》一文,梳理了清代汉水流域以驿道为主干的陆路交通,以汉江为主干的水上运输、汉江干支流的主要港口,探讨了交通变革与汉江流域城镇兴衰的关系,并指出交通方式的变革对沿线区域内城镇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历史的鉴戒意义。《郧阳文化生长力及其典型样态初探》一文,认为地域文化的生长与地域的历史变迁以及区域内人们的智慧创造紧密相关,并以郧阳文化为例进行了阐释,有理有据。《五斗米道研究综述》一文,对与汉水上游地区密切相关的五斗米道的起源与发展,五斗米道的思想文化、教义制度,五斗米道的人物研究和考古研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以利人们窥其全貌。

“文学艺术篇”共收录了16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论析了汉水流域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名家名作的文化底蕴。如《汉水流域地理环境与流域文学发展》一文,论析了汉水下游和中上游地理环境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对不同区段的文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区段文化的地域特色。《唐宋诗人与汉中》一文,在文学地理学的视阈下解析了唐宋时期著名诗人与汉中相关的作品、唐宋诗人在汉中的诗歌创作活动,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故可借助诗人的作品,了解唐宋时期汉中及周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概况。《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一文,认为王士禛的栈道诗,是其诗风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其山水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栈道沿线尤其是汉中地区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重要载体。《王蓬小说中的“自然”——以〈山祭〉为中心》一文,指出汉中本土著名作家王蓬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人物的附属品,而且是有独立价值的主体,具有独特的文学属性。《陆游从戎南郑交友及其影响述论》一文,认为汉中的境遇与机缘,把陆游和他的僚友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用诗文勾勒着彼此生命的轨迹,于墨香中憩息饱经沧

桑的灵魂。深刻真挚的友情,正是陆游念念不忘汉中的内在动因之一。《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碑记》一文,对这两所抗战时期分别迁于汉中和昆明的高校,在离开迁驻地时所留的勒石碑记作了对比,指出二者分别总结和记载了各自学校的历史经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厚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乃值得细心品读的美文。《汉中方言部分语法规则调查》一文,对汉中方言的部分语法规则进行了调查和描述,对汉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加以注音、释义和举例,并说明其句法环境,在较少为人关注的方言学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篇”收录的6篇文章,结合汉水上游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汉水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调研报告》,通过开展实地调查,对汉江水源地生态补偿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提出了建议。同时认为生态补偿效率直接决定着水源地生态保护效果,对南水北调工程的长期效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汉江流域发展研究》一文,梳理了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4种可持续发展形态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从不同的角度对4种可持续发展形态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启示,即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协调与有效合作。《陕南移民搬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陕南的移民搬迁进行了分析,认为陕南移民搬迁首先是一种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同时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只有在制度创新的前提下,移民搬迁才能取得长久效益。《产业经济学视野下等陕南移民搬迁》一文,认为产业开发对移民搬迁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结合实际提出了陕南移民搬迁产业开发的对策建议。《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经济化问题——以汉上上游地区为例》一文,结合汉水上游地区经济生态化的现实要求,分析了生态经济化的基本过程,提出了绿色产业、生态农业园、生态工业园、CDM项目、生态补偿等生态经济化路径。

限于篇幅,以上仅就本集刊的部分文章作了简要的导读,其余的文章也各有见地,无法一一评述。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门类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地拓展其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共同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献计献策,推动汉水流域区域经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汉水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更要着眼于当今汉水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找准目标,克难攻坚,以使学术研究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汉水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汉水文

化研究中心的职责,还应在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效能的同时,大力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关注、参与汉水流域文化的研究,开拓汉水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使汉水文化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这不仅是我们的意愿,更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腾飞的历史使命。

刘保民

2015年6月

目 录

历史文化篇

说“汉”	梁中效
历史上的骠骆道南段勘察记	郭荣章
清代汉江流域交通与城镇兴衰	张笃勤
汉水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西虎 王淑新 王吉清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对汉水风俗文化研究的价值浅析	何道明
樊城山陕会馆碑刻及其史料价值	张平乐 李秀桦
大禹治理汉江史考	李佩今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梁中效
浅论南宋川陕边界的关外营田	马元元
吴玠吴玠及其子孙汉中宦途遗迹考述	孙启祥
五斗米道研究综述	陈 辉
汉水流域民间信仰研究述评	樊丽沙
汉水上游羌族宗教信仰的非典型性特征	邢海虹

文学艺术篇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书后	冯岁平
汉水上游史籍遗存搜集与整理	郭 鹏
汉水流域地理环境与流域文学发展	王吉清
从《诗经》“二南”看汉水上游与秦楚、巴蜀文化的关系	杨 名
汉中方言部分语法规则调查	张 璐 李 丹
唐宋诗人与汉中	李青石
陆游从戎南郑交友及其影响述论	付兴林 胡金佳
从戎南郑对陆游书法之影响	严都岩

近三十年陆游“汉中诗词”研究综述	宫臻祥
清代汉中栈道行程考——以王士禛、竹添井井、俞陛云的游记为例	林 啸
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	李宜蓬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碑记	陈一军
西北联大时期汉中的社会生态	陈海儒 李巧宁
从对《石门颂》的探讨看石门石刻文献的宋代学术对话	许净童
论王蓬小说中的“自然”——以《山祭》为中心	火 源
“汉调桄桄”的儒家情怀与地域文化特征	姚秋霞

区域经济篇

汉江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调研报告	胡仪元 杨 涛 刘 萌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汉江流域发展研究	王淑新
陕南移民搬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冯明放
努力破解生态移民的三大困境——陕南生态移民实证研究	余 艳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经济化问题——以汉水上游地区为例	马彩虹
产业经济学视野下的陕南移民搬迁	彭 洁

汉水文化研究 历史文化篇

说“汉”^①

梁中效

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南北江河的轴心地带正是汉水。汉水流域位于中国大陆版图的地理中心,是中国内陆腹地秦陇、巴蜀、中原、江汉四大经济文化板块的结合部,是融通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族形成和得名的摇篮,在壮美的中华文明史和汉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远古灵秀地,文化早发祥

汉水流域是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与天上的银河辉映竞秀,《诗经·小雅》已有“惟天有汉,鉴亦有光”的名句,《华阳国志》更明白地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奇特的天人感应现象,让汉水赢得了“天汉”的美名。汉水流域是中国中东部通向辽阔西部的文化走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湖北郧县人化石的发现和陕西南郑龙岗寺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证明至迟在12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汉水中上游开拓渔猎;农耕文明产生之后,伏羲、女娲由西北高原沿汉水向东南迁移,炎帝诞生于秦岭南坡的华阳,在汉水中游的随州创造了南国农业文明的辉煌,奠定了中草药文化和茶文化的基础,使汉水流域成为东亚农耕文明的圣地,同时也奠定了华夏族——汉族形成的文化基础。

以汉水流域为核心,其周围分布着古老的华夏部族、苗蛮部族、东夷部族和氏羌部族,他们以汉水流域为舞台和纽带,走向交流与融合,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文化民族——汉族。

汉水流域西北方向的渭河、汾河、伊洛水流域是华夏族主干——炎黄部族诞生与活动的核心区域。《国语·晋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缙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圈内的大国晋国,已将“黄、炎”并称为二帝,而且认为二帝都诞生在秦岭北部的关中大地。《国语·晋语

① 原载于《安康学院学报》,2014年6月第3期。

四》记载:“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证明炎、黄二帝族源相近,血缘相通,其母系皆出自有蟠氏。因而《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炎帝和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关中、晋南、豫西三大盆地鼎足而立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属于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蟠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可知炎帝母是有蟠氏女,在秦岭南坡的华阳生下炎帝,说明炎帝是由汉水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黄帝则成为北方农耕文明的偶像,以汉水、淮河为过渡带,炎、黄二帝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水流域正西方向的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是氏、羌部族活动的核心区域。传说时代的羌人与氏人常常相提并载,《诗经·商颂·殷武》云:“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说明氏羌并称普遍。《荀子·大略篇》曰:“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说明氏羌皆有火葬习俗。氏羌部族处在秦国西部,《山海经·海内经》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农,先农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但氏、羌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个民族。《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曰:“羌,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实际上羌人是兴起于我国西部最古老、最有影响的部落之一,《史记·六国年表》有“禹生于西羌”记载,尤中先生甚至认为,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黄帝族、夏族、周族,原本都是羌人。先秦文献对氏人的记载相对较少,《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杨铭在《氏族史》中指出,氏人国应在陕甘交界处,与历史上氏族的传统居住区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远古氏、羌是生活在西部高原的甘、青和川、陕西部的两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或部落,是华夏农业、水利事业的开拓者,是后来华夏族形成的重要基础。

汉水流域正南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东夷集团。《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曰:“夷,东方之人也。”东夷集团的组成比较复杂,先秦典籍称为“九夷”,有学者将其分为太皞、少昊(少皞)和蚩尤三部分,也有学者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淮夷五大部分。不论怎样,东夷发达的经济文化不可小视。夏、商、周三代就在与东夷的和战之中,相互学习,融合发展起来的,而交流对抗的走廊是汉水流域。《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

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诗中以江汉水流之浩荡,来衬托周宣王的大将召虎征讨淮夷大军之强大威猛。傅斯年先生在其名篇《夷夏东西说》中指出:三代及三代以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三代中东胜西之事甚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汉水流域是联系南北的纽带和沟通东西的走廊,为四方百族在此融合,为华夏族——汉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水流域正南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苗蛮集团。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将南方苗蛮称为“苗”“蛮”“三苗”“有苗”“苗民”“南蛮”“荆蛮”等。《尚书·益稷》曰:“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云:“齔寡有辞于苗。”《尚书·牧誓》说:“窜三苗于三危。”《大戴礼记·千乘》曰:“南辟之民曰蛮。”《大戴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大约在尧、舜、禹时期多称“苗”“三苗”“有苗”等,至西周以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则称之为“蛮”“南蛮”“楚蛮”等。在语言学上,“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音、义相同。《广雅·释詁》将“苗”“蛮”均作“惕”(轻易之意)。故徐旭生先生说,“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集团是比较恰当的”。苗蛮集团主要生活在北起丹江、南到五岭的江汉大地之上,《战国策·魏策》引用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而尧、舜、禹时期的苗蛮势力曾以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丹江流域为基地,《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境内的秦岭南坡,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江。由于这里是中原进入江汉的大通道,因而成为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冲突、融合的大舞台,促进了华夏族——汉族的形成。

汉水流域是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竞争、融合的大舞台,其部族大融合的结果是造就了华夏族中最具活力与魅力的楚族。《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丹阳是楚国早期都城,有丹淅丹阳和荆山丹阳两地,皆在汉水流域。清人宋翔凤在《过庭录》考证出鬻熊所居之丹阳,即汉水上游丹江与淅水相会之处的丹阳。熊绎所居之荆山丹阳在汉水中游,其范围是北不过汉水,南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今南河),东不过鄢水(今蛮河)。楚民族从丹淅丹

阳迁到荆山丹阳,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筚路蓝缕,发展壮大。史学家吕思勉说:“宋氏翔凤始考得丹阳在丹、浙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至武王徙郢,乃居今之江陵。吾侪读此,乃知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浙一带,实为古王即封于此;《书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诸侯,归之者四十国’;周南之地,《韩诗》谓在南郡、南阳之间,皆是物也。周公奔楚,盖亦袭三分有二之势,故出武关,走丹、浙矣。”楚族携苗蛮、东夷和炎黄三大集团杂合的文化优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地英才项羽、刘邦联合推翻暴秦,刘邦崛起汉水上游汉中盆地,夺取关中,决战中原,霸王别姬,被刘邦击败,汉室天下肇基于汉中,华夏族——汉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汉之渊源地,天人合一美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族——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江、淮、河、汉并称的四大文化大河之一,《孟子·滕文公》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汉水能有如此影响,与其特殊的文化地位有关。

与汉水有关的“汉”字,商朝甲骨文里没有“汉”,但香港著名国学家饶宗颐在《西南文化创世纪》中指出:甲骨文中的“漾”就是指“汉”。他认为:“殷卜辞所见水名,有河、洛而不见江、汉,向来未明其故。”“考殷卜辞贞人有曰漾者,字从羊,与洋相同。武丁卜辞有残文三条:漾与吉方同见于一片。”“漾即汉水之源”,《水经》郦注引阡驸云:“汉或为漾。”“汉”(漢)字在小篆中的字形,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言:“从水,难省声”。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难省声。徐铉等曰:从难省,当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漾也。尚书某氏传曰。泉始出山为漾。本意指的是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金文中的“汉”,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甗》铭文。春秋战国时期楚人与秦人的文字中都有汉水,但字形结构有别,也反映了楚人与秦人的汉水文化观念不是一个系统。而在先秦文献中,记载汉水最多、最可靠的典籍是《诗经》。《诗经》中的“汉”一般都指汉水。《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大雅·常武》:“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在这些美妙而形象的诗句中,所提到的“汉”都指汉水,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江汉”并提,说明在先秦时期汉水是一条与长江并称的大河。《诗经》也体现了地汉与天汉交相辉映的美丽情景,《诗经·小

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由《诗经》来看，“汉”之本义是指汉水，其河流处在华夏之中的西北——东南走向，与天上银河系的走向相同，天汉因地汉而得名，这即是《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谓“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使汉水的文化地位甚至在长江之上，而且《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即汉水女神，是我国第一位江河女神，更显示了汉水文化地位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华夏族、汉族的称谓与汉水有关，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汉水因何而被称为“汉”，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

历史学家任乃强指出：“汉”字，在西周以前只作天上银河专称。《诗经》曰：“倬彼云汉”“维天有汉”，皆此义也。沔水冲出万山，奔腾入楚，楚人以为自天上来，借用“汉”字以名之。沔水，自今陕南东流入楚，至汉口入江，古有汉水、沧浪之水、夏水等特称。故汉口古代又有“沔口”“夏口”之名。史学家何光岳认为：古汉人原居于今陕南汉水一带，汉水因古汉人居此而得名。古汉人盛行着雒文化，传播到东亚、北亚和东南亚各地，形成了广汉文化圈。后来由于夏人迁入汉水上游，古汉人融入夏人群体之中，成为华夏族的成员。

近代民族史学家徐松石发现“汉”是濮越语 hun“人”的汉字音译，在一定程度上为破解“汉”“汉水”“汉中”“汉朝”“汉族”之“汉”从何而来的文化密码打开了新领域。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对“汉”字的原义，作了前所未有的独到论述：“壮僚（僚字音佬，唐时作獠——原注）向来称呼自己为汉人汉子。壮话叫男人为勒汉，勒汉就是汉儿。壮僚自称为汉儿，而汉人却指他们异于汉人血统的夷僚，对他们表示轻贱侮辱的态度。天下间冤枉的事，莫过于此。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觉得壮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更合事理”。

语言学家金钟极为赞同徐松石的观点，而且利用历史语言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壮族是古濮越 pu ji（“种田人”的汉字译音）人的后裔，壮语的“我们”读作 lau，因而南北朝以后，被用汉字音译写作“僚”，用来指称濮越人后裔壮侗语族诸民族。徐松石不懂得语音学，因而不能正确指明壮语的 lak hun 中的 hun 就是被古人用汉字译音而写作“汉”而流传了数千年。但是，由于他也像古人一样，使用汉字作为译音工具，把壮语的 lak hun 音译写作“勒汉”，因而无意中发现了壮语的“汉”与自称的“汉人”的“汉”两者的内在渊源关系。尽管他弄不清也想

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渊源关系,现在壮人与汉民族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而两者的自称却又如此偶合,彼此都自称为“汉”。因而,可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汉实源于壮。然而,他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壮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更合事理。”

民俗学家林河认为先秦时期将中国南方的“粳民”(种粳稻的人)译为“荆蛮”。其后裔即今日的“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各民族。“粳民”在一万年前发现和栽培了“粳糯”,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缔造者。中国农耕文明的主体是稻作文化,而稻作文化的主体是“中国粳”,因此,“粳民”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真正首创农耕的民族。在上古音中,“粳”与“糯”是一音之转,略有区别而已。“难”字,古与“傺”(糯音)字相通,但它又与“干”(粳音)字通韵。长江的支流——汉水,从长江直插陕西,与黄河的一些支流交错。汉水这一联系南北的天然走廊,不但把南方的暖流带入了陕南,在陕南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江南小气候,而且把南方的“粳文化”也带到了陕南。陕南汉水流域 7000 年前的李家村、何家湾稻作文化遗址,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由于有了“粳民”在此繁衍生息,这一条水域也就被定名为“汉水”(粳水)了。汉水之所以叫“汉”,与江汉平原是中国最富裕的粮仓有关。由于生活在江汉平原上的自古就是中国的“傺民”,所以便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命名为“难”(傺)水了。因此,“汉”字只不过是“傺”字,去掉了左边的“人”字旁和右边的“佳”字旁,单取中间的“堇”字作音符,并加上了一个“水”字旁而已。此说虽然从农耕文明的本源追溯“汉”的来历,但难免牵强生硬。

三、天汉三千里,汉族得美名

汉族是以汉水、淮河为轴带,以黄河、长江为范围,融合四方百族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传说时代的北国华夏部族、江淮东夷部族、南方苗蛮部族、西部氐羌部族,正是以汉水为纽带逐渐融通,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龙凤呈祥为图腾的民族共同体。楚人、楚族就是这一共同体中最活跃、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个分支,他们在汉水流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秦楚争雄和秦汉更替的壮美历史进程中,汉族的名称也在汉水流域孕育诞生。“汉”之本意是指水,原本是说汉水是条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的文化之河,至迟到西周中期已与天上的银河联系在一起,促成这一美妙结合的正是楚人。《左传》有“汉,水祥也”的描述;萧何有“语曰‘天汉’,其称甚美”的说法;《史记》有“汉,水之精也”的议论;《说文解字注》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的解读。实际上《诗